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史研究方法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澳) Anthony Pym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史研究方法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澳) Anthony Pym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 - 2006 - 1836

© Anthony Pym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ose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either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s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CLA),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9HE. In North America, registered users may contact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 01923, USA.

First published by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任何文字,作全部和局部之翻印、仿制或转载。

本书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影印版。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史研究方法 =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 (澳)皮姆(Pym, A.)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1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600 - 6188 - 7

I. 翻… II. 皮…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方法—英文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347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0 - 6188 - 7

定 价: 24.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人类对翻译活动的关注由来已久。据记载,西塞罗(Cicero)在公元前1世纪已提出广为后人所熟悉的译词和译意两种翻译方法。尽管对翻译的研究可谓是源远流长,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过往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这种情形可能与翻译活动在传统上不受重视(相对于创作而言)、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处于学术界的边缘有关。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类对翻译活动越来越重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渐确立,研究翻译史的著作也渐渐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60年代始,欧美出版的较有影响力的翻译史(包括翻译理论史)著作包括卡里(Cary, 1963)、施特里希(Störig, 1963)、穆南(Mounin, 1965)、克勒普弗(Kloepfer, 1967)、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75)、托马斯·斯坦纳(Thomas R. Steiner, 1975)、凯利(Kelly, 1979)、奥尔格林(Horguelin, 1981)、贝尔曼(Berman, 1984)、诺顿(Norton, 1984)、范胡夫(Van Hoof, 1986, 1991)、桑托约(Santoyo, 1987)、里纳(Rener, 1989)、巴拉德(Ballard, 1992)、勒弗维尔(Lefevere, 1977, 1992a, 1992b)、弗米尔(Vermeer, 1992, 1996)、德莱尔(Delisle, 1987)、万斯(Vance, 1993)、德莱尔和伍兹沃思(Delisle and Woodsworth, 1995)、韦努蒂(Venuti, 1995)、鲁宾逊(Robinson, 1997)、迪尔(D'hulst, 1990)、科普兰(Copeland, 1991)、皮姆(Pym, 2000)¹等等。

国内方面,自1984年马祖毅出版的第一本翻译史专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算起²,至今已陆续出版了至少18部翻译史研

1. 这些国外出版的翻译史著作全名及出版时间、地点可于皮姆在本书后开列的“参考书目”(References)中找到(Delisle, 1987; Vance, 1993; Pym, 2000除外)。为节省篇幅,本导读参考书目处不再重复列出这些著作。

2. 在马祖毅之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翻译史话》一书,尝试记录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这可以说是国人编写翻译史的首次尝试,但可惜该书仅完成4回。到了50年代,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一书,是国内首部完成的翻译文学史,但该书一直只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通,未能正式出版。有关《翻译史话》及《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初稿)这两本书的评价,参见谢天振(1998: 1—19)。

究著作,分别为陈玉刚(1989)、臧仲伦(1991)、陈福康(1992)、黎难秋(1993, 1996, 2002)、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4)、邹振环(1996)、孙致礼(1996)、穆雷(1997)、王克非(1997)、马祖毅与任荣珍(1997)、郭延礼(1998)、王宏印(2003)、王秉钦(2004)、谢天振与查明建(2004)、方华文(2005)等³。

但在这繁荣的背后,我们亦注意到,治翻译史同样需要方法学的规范,避免以单纯罗列历史事件为史,这既缺乏重点,又缺少对事件产生原因的深入讨论;亦要避免出现立论草率、缺乏证据支持的结论,更要避免带有史实错误的硬伤⁴。

那么,翻译史的选题有何技巧?翻译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翻译史的写作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和遵守怎样的原则?翻译史研究有无理论?相信这些均是正在从事或有志于翻译史研究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由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一书正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写,对翻译史写作和研究都有很强的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此书内容编排得当,讨论问题深入浅出,且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出版后在翻译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学者特意在权威的翻译研究杂志推荐此书,认为该书不仅是一本翻译史研究和写作的案头必备书籍,且对有志于翻译史研究的研究生而言,更是一本“绝佳的基础、入门书籍”(Cronin 1999: 401)。

本书作者皮姆为澳大利亚人,1956年2月25日生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Perth),先后在该城的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取得人类传播学学士学位及比较文学荣誉学士学位。随后负笈法国,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获得社会学硕士及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博士学位。皮姆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哥廷根乔治-奥古斯特大学、比利时荷语鲁汶天主教大学担任研究员或教职,现为西班牙塔拉戈纳省洛维拉维吉利大学教授。辗转于不同国家的教学研究经历使其对翻译的交互文化性质(intercultures)、译者的迁移特性和多重文化身份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认识。迄今为止,皮姆共出版了6部专著,其中1992年出版的《翻译与文本转移:论跨文化交际的原则》(*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 An*

3. 对这些翻译史的(部分)评论,可参见王宏志(1999)、穆雷(2000)和孔慧怡(2002)。

4. 如国内不少著作把清末民初翻译家包天笑只译出哈格德(Haggard)的小说 *Joan Haste* (包译名为《迦因小传》)下半部分而未译出上半部分的原因归于包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上的自我检查(上半部分含有主角 Joan Haste 未婚先孕的情节)。但事实是,包在当时只觅得哈格德原书下册,因而不得不从下册译起(参见包天笑,1971);又如不少国外翻译史著作都把西班牙12世纪时期子虚乌有的托莱多译员培训学校(college of translators at Toledo)当作史实来论述。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反响尤为不俗。此外,他还编有 7 本论文集,发表了 140 余篇论文。这些著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突出翻译与整个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立场显然与其所接受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不无关系。《翻译史研究方法》一书亦正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研究立场: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翻译史。

本书基本内容

本书除前言外,共 12 章,分别论述历史、重要性、编纂目录、操作定义、频率、网络、规范与系统、共有系统、原因、译者、交互文化和交叉学科等主题。上述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第 1—6 章)围绕如何具体书写翻译史这个主题,详细说明了种种编写翻译史的方法,包括选题、编纂译作目录、运用操作定义展开研究、运用数据资料增强史料说服力、运用各种线索确定不同史实之间的联系等;后半部分(第 7—12 章)则侧重理论上的探索,探讨如何解释翻译活动形成的原因及怎样揭示其内在规律等等。

在前言部分,皮姆开宗明义地表明,研究译史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我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为翻译史研究制定了 4 条原则:1) 翻译史研究需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即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social causation)问题;2) 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也不是与译本相关的各种背景因素,也不是译本的语言特征,而只能是作为人的译者(human translator);3) 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故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过的社会环境展开;4) 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影响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介入不可、也不应避免,反而需大力发扬。这些原则突显了社会环境及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强调社会影响个人而个人又对社会具有能动作用的社会学重要理念非常相似。

具体而言,第 1 章“历史”(History)详述与翻译史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翻译史的本质、组成部分和翻译史研究的理由。皮姆认为,即便是在现代译学研究中,翻译史研究亦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把翻译史看成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完整、独立的研究领域,与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享有同等重要性,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的译者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p.4)。他认为翻译史至少可分为 3 个研究领域:一为翻译考古学(translation

archaeology), 负责记录和挖掘翻译活动的基本史实, 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经过、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译作的影响等; 二为历史批评 (historical criticism), 负责收集和分析前人对历史上出现的翻译现象的评价; 三是解释 (explanation) 翻译行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出现的原因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三部分是相互依存但又有一定独立性的领域。

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是研究翻译史的第一步, 亦是重要一步。题为“重要性” (Importance) 的第 2 章讲述的正是如何从众多可能的翻译史研究问题中选择一个适当的、具有相当重要性的题目。皮姆认为研究问题贵精不贵多, 通常一个重要问题已经足够做一个研究项目。一个研究问题是否重要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假如你能对一个平常的问题提出新见解, 那么这个原本普通的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在独具慧眼的研究者眼里, 没有普通问题, 只有普通的研究者和普通的答案。例如, 对于谁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佛经译者这个普通问题, 孔慧怡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和资料挖掘得出了与大多数研究者不同的答案: 她认为鸠摩罗什才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出色的佛经翻译家, 而非人们普遍认可的玄奘 (2005: 75-86)。这样, 原本平常的问题, 因为研究者的新见解而变得不平常起来。

我们知道, 光凭分析孤立的几个译本是不能写出任何翻译史的。为了验证一个研究假设, 我们需要研究大量的译作。但皮姆认为, 并非所有的译本都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必须有选择性地选取一些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译作来作为研究对象。第 3 章“编纂目录” (Lists) 即讲述筛选合适译本的原则和必要性。他区分了编纂过程中涉及的两个概念: 编纂总书目 (catalogue) 和编纂研究书目 (corpora)。前者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列出特定研究领域中的译作; 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一个或多个研究假设, 所选书目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 其完整性只是相对的。

编纂译作目录时, 我们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目标语文本中确定哪些是翻译作品。由于各种原因, 历史上有不少译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删节或改写, 例如中国晚清时期的诸多文学翻译作品就是一些很好的例子。那么, 仿作、改编、重写算不算翻译? 它们是否应该列入研究目录? 第 4 章“操作定义” (Working definitions) 即讨论如何以“操作定义”的形式来解决上述这些基本而又相当重要的问题。皮姆提出, 我们可以借助叙述学家热内特 (Genette) 于 1978 年提出的“衍生文本” (paratexts) 的概念来确认目的语文化中的译作。“衍生文本”指所有用于提示标准文本 (text proper) 的文本材料, 如封面、作者名、题目等。皮姆认为, 翻译

作品的“衍生文本”一般会包括用于提示文本为译作的标志,如译者姓名、原作名称或原作者等等。从中,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对翻译史研究非常有用的操作定义:具有翻译作品“衍生文本”特征的文本均为译本。

第5章“频率”(Frequencies)讲述如何根据翻译年份为研究对象编制频率曲线图表(frequency curve)。皮姆认为,这些曲线有助于研究者证实或否定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或假设。但他同时亦指出,运用数据或频率曲线来说明问题时要非常小心。他通过大量的例子证明,即便是同一组数据,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用上不同的修饰语(如“only 30%”和“as much as 30%”),可能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他在本章还以知名学者韦努蒂的某些观点为例,指出韦努蒂有目的地误读数据以得出“受操控的”(manipulative)研究结论。

在翻译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遇到由于缺乏足够线索而难以为继的现象。这时,我们就得求助于第6章讲述的“网络”(Networks)了。所谓“网络”是指由所有可能与译作相关的线索组成的一种关系网络。皮姆以自己研究德国歌剧作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法国的译介为例,详述了建构这种网络的种种方法,包括细读译文,从刊发译文的杂志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从而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自己所需的重要线索。

与前面几章的实用取向不同,从第7章至结尾部分为作者对翻译史领域的理论探索。在第7章“规范与系统”(Norms and systems)里,皮姆质疑“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和“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两个在现代翻译研究中颇具影响的概念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实用性。他认为“翻译规范”只是强调翻译活动体现出来的稳定性或不变性(stability),而忽略了翻译活动变化的一面,且“翻译规范”未必总是个别文化所特有的(culture-specific)。至于“多元系统”理论,他觉得“系统”一词界定不清,有同义反反复之嫌(tautology);同时,该理论还无视各国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研究者的主体性作用,而后者却正是皮姆认为在翻译史研究中应大力发扬的。

在批评“规范”与“系统”这两个概念不适用于翻译史研究后,皮姆在第8章提出研究翻译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寻求译史中所体现的“共有系统”(Regimes)。“共有系统”这个概念最早由国际政治研究学者约翰·鲁杰(John Ruggie)于1975年提出,指由部分国家或地区“共享的一系列想法、条例、制度、计划以及组织上和金融上的共同承诺”。皮姆认为“共

有系统”这个概念能够提供比“规范”和“系统”这两个概念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使翻译史研究能在此框架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为了显示该概念的适用性,皮姆提供了几个如何寻找“共有系统”的个案分析,强调该概念尤其有助于解释跨文化关系中的理解、交流和合作的产生过程。

第9章题为“原因”(Causes),皮姆认为寻找翻译现象的深层原因是翻译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描写翻译学的学者往往把翻译事件发生的原因归于目标语文化的种种因素,而目的论学者则把原因归于译者的目的或是翻译委托人的指示,这些解释在皮姆看来均是不全面的。他指出,一个翻译现象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往往不止一种,而上述观点把这些原因简单化了。因此,在书中他采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归纳的4大类原因,即物质原因(material cause)、最终原因(final cause)、形式原因(formal cause)和效率原因(efficient cause)来说明如何更全面地解释翻译现象的起因。

第10章题为“译者”(Translators),主要讨论译者在翻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皮姆首先强调翻译史所研究的不应是一位译者,而是一群译者。研究时,我们不仅要叙述译者的生平经历,更重要的是还应注意其作为一位普通的、活生生的人而具有的一切生物特征和习性。比如,他们需要谋生、养育后代,或为了生计而奔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间。这亦注定了译者的翻译动机只能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皮姆亦指出,世界上的译者事实上绝大部分都非专门以翻译谋生,但以往的翻译史对于这一特点却往往视而不见。因此,皮姆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应注意译者的多重身份及从事翻译工作的多重目的,切勿把译者问题简单化。

第11章题为“交互文化”(Intercultures),讨论的重点是译者的文化归属问题。皮姆首先区分了“跨文化”(cross culture)、“多元文化”(multiculture)和“交互文化”这几个重要的术语,认为译者不单属于目标语文化或源语文化,更准确地说,他是属于这两种文化的重叠或交汇的部分(即所谓的“交互文化”)的。如果译者熟悉3种以上的文化(皮姆本人即是一例),那么“交互文化”区域就由3种以上的文化的交汇部分组成。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是由译者的迁移性决定的。但由于在翻译研究领域里两分法(binarity)思维长期盛行,译者的文化取向往往被定位为只能在目标语文化或源语文化中择其一。这种把译者的文化态度绝对对立的立场显然是不利于充分解释翻译现象的。

第12章题为“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主要讨论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皮姆认为,翻译史的交互文化特点注定了它不可能是比

较文学的一部分，亦非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而应是跨文化史的一部分。但由于翻译史研究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翻译史研究的“交叉学科”性质。

本书特色

实用性、指导性强是本书阅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本书的前半部分相当于一本翻译史写作教科书，当中讨论的均为非常实用而又在普通翻译专著上不易见到的专题（如怎样编纂目录和如何运用频率曲线来论证假设等等），读后令人启发良多。

在理论探索上，本书亦颇有特色。虽然整本书以讨论翻译史为中心，但作者并不拘泥于史实，亦不人云亦云地附和其他理论家的观点，而是在大量分析翻译史实以及个人研究经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理论修养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书中除翻译史问题外，皮姆还对某些影响很大的当代翻译理论（如翻译规范论、多元系统论、目的论等）作了深入的、眼光独到的评论，因而令本书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适用性。但我们亦要注意到，翻译史研究因其独特的理论关怀和方法学系统，与一些从翻译研究整体范围上提出的理论存在着研究焦点上的不重合。皮姆在书中对上述理论褒少贬多，实是基于翻译史研究的立场，须从治翻译史的语境去理解，而不可据此忽视或贬低上述理论对促进翻译学科向纵深发展的作用。

另外，皮姆书中对过往翻译研究中流行的两分法的分析和批判更可谓是相当精到和犀利。虽说在皮姆之前已有学者意识到这种两分法的弊端（Snell-Hornby 1988: 9-11），但尚无人提出这种两分法亦人为地造成译者的单一文化取向的论断。在此意义上，皮姆所倡导的译者具有“交互文化”的观点就具备了一层理论上的新意。书中其他值得注意的观点还包括在解释翻译现象时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这从另一种意义上，相当于否定译者的决策过程全由外界社会因素决定，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色彩。事实上，这亦正是当今翻译研究发展的新趋势之一（Baker 2003: 27）。

在语言运用方面，皮姆是翻译研究领域少见的一位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家。其写作语言以口语为主（如不时夹杂俚语，并大量以代词“I”来展开讨论），绝少运用大词、难词，语言清新幽默，令读者感觉更似与作者闲聊而非听学术讲座。这种阅读愉悦绝非是阅读常见的一本正经的学究

式论著所能给予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皮姆书中对其他学者的尖锐批评虽大多有理有据，但仍有部分实属逞一时之快的意气用语，缺乏理性的论证。有些还有刻意曲解被批者原意以及故意贬低对方之嫌。例如，第 198 页对韦努蒂的强调译者干预性理论 (intervention theory) 的批评就明显过于苛求且无凭据。另外，皮姆还有些观点亦值得商榷。如在第 141 页，在论及华沙条约瓦解后北约继续保留翻译机构的原因时，皮姆虽然注意到该机构的功能有了变化，但仍把它的存在主要归于是北约有充足的翻译经费（这一点似乎符合皮姆提出的“共有系统”理论），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很明显，北约翻译机构继续存在的原因显然尚有政治、经济和宣传上的考量。另外，在论及译者的主体性时，皮姆未能把当代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 的成果纳入讨论范围，亦未讨论女性译者的特点，这亦为一小失。但瑕不掩瑜，此书对于对翻译史研究以至于整个翻译研究有兴趣的读者而言，仍不失为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值得大力推荐。

参考文献

- Baker, Mona. 2003. The Pragmatics of Cross-cultural Contact and Some False Dichotom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24, No. 1, pp. 25–29.
- Cronin, Michael. 1999. Book Review of Anthony Pym's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Target*, Vol. 11, No. 2, pp. 399–401.
- Delisle, Jean. 1987. *La traduction au Canada/ Translation in Canada, 1534–1984*. Ottawa: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 Pym, Anthony. 1992. *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ankfurt/Main,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Vienna: Peter Lang.
- Pym, Anthony. 2000. *Negotiating the Frontier. Translators and Intercultures in Hispanic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Snell-Hornby, Mary. 1988.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Vance, Laurence M. 1993.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Pensacola, Fla.: Vance Publications.

- 包天笑. 1971. 钏影楼回忆录. 香港: 香港大华出版社.
- 陈福康. 1992.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陈玉刚. 1989.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方华文. 2005.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 郭延礼. 1998.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柯 飞. 2002. 译史研究, 以人为本——谈 Pym《翻译史研究方法》. 中国翻译. 第 3 期.
- 孔慧怡. 2002. 重写翻译史. 21 世纪. 总第 71 期.
- 孔慧怡. 2005. 重写翻译史.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 黎难秋. 1993. 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黎难秋. 1996. 中国科学翻译史料.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黎难秋. 2002. 中国口译史. 青岛: 青岛出版社.
- 马祖毅. 1984.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年增订版).
- 马祖毅、任荣珍. 1997. 汉籍外译史.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穆 雷. 1997. 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 北京: 开明出版社.
- 穆 雷. 2000. 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 中国翻译. 第 1 期.
- 孙致礼. 1996. 1949–1966: 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王秉钦. 2004.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王宏印. 2003.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王宏志. 1999.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王克非. 1997. 翻译文化史论.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谢天振. 1998. 中国翻译文学史: 实践与理论. 中国比较文学. 第 2 期.
- 谢天振、查明建. 2004.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臧仲伦. 1991. 中国翻译史话.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李德超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Contents

Preface	xxi
Acknowledgements	xxvii
1. History	1
History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1
The part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4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separateness of the parts	6
A too-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9
Reasons for doing translation history	15
2. Importance	20
What is importance?	20
Against blithe empiricism	24
Personal interests	30
Research and client interests	31
Subjective interests and humility	36
3. Lists	38
Reasons for lists	39
Getting data	4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talogues and corpora	42
Shortcomings in bibliographies: four examples	42
Completeness in history and geology	48
Sources as sifted sands	50
The historian as reader of indexes	53
4. Working definitions	55
Why some information has to be thrown out?	55
In defence of definitions	57
Inclusive definitions	58
Defining translations from paratexts	61
Corpora of borderline cases	65
How Wagner sneaked in?	67
How Salomé danced out?	68

5. Frequencies	71
Statistics and importance	71
Diachronic distribution	74
Retranslations, re-editions and nontranslations	79
Retranslation and its reasons	82
A general diachronic hypothesis	84
6. Networks	86
Reconstructing networks from within	86
Mapping networks	91
Two cheap transfer maps	93
Lines and symbols	97
The spatial axis	102
Cities as borders	105
7. Norms and systems	106
Actually reading translations	106
Norms?	110
Systems?	115
Leaps of faith	118
The will to system	119
Subjectless prose	122
Where's the gold?	123
8. Regimes	125
What are regimes?	125
Starting from debates	128
A regime for twelfth-century Toledo	130
A regime for Castilian protohumanism	132
A regime for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anthologies	136
Translation as a transaction cost	140
9. Causes	143
Systemic and probabilistic causation	144
Aristotle	148
Transfer as material causation	150
Final causes in theories of systems and actions	151
Equivalence as formal cause	155
Translators as efficient causes	157
Multiple causation	158

10. Translators	160
Translators, not 'the translator'	160
Translators can do more than translate	161
Translators have personal interests	166
Translators can move	172
Translators can go by several names	174
11. Intercultures	177
Where intercultures are hidden?	178
Translations or translators?	182
Strangers and trust	183
Interculturality and its negation	186
Intercultural professions as a social context	187
An alternative basic link	189
What is a culture?	190
12. Interdisciplinarity	193
Personal reasons for pessimism	193
A lacking discipline	195
Cultural Studies?	198
Intercultural Studies	199
References	203
Index of Names & Topics	215

1. History

This chapter will outline the general nature of translation history, particularly its parts, its background, and a few reasons for its existence. These are all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approach to be elaborated in greater detail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History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James S Holmes' seminal lecture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 set out to orient the scholarly study of translation. It put forward a conceptual scheme that identified and interrelated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nvisaging an entire future discipline and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work aimed at establishing that discipline. Historically, this was a major step forward, none the least because it involved a frontal attack on the hazy but self-assured categories that had long been used to judge translations. Holmes' categories were simple, scientifically framed, and hierarchically arranged: 'Applied' was opposed to 'Pure', the latter was broken down into 'Theoretical' and 'Descriptive', then 'Descriptive' divided in turn into 'Product Oriented', 'Process Oriented' and 'Function Oriented', and so on. Figure 1 shows the apocryphal graphic form these categories received later from scholars who saw it as a legitimate point of departure. Many wonderful things found a place in this map; a few more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modifications and variants proposed since (notably Lambert 1991a, Snell-Hornby 1991, Toury 1991). Of course, translation studies cannot be reduced to this one map, and the map itself has been evolving dynamically, along with the lands it purports to represent. Yet the curious fact remains that neither Holmes nor his commentators – at least those subscribing to the map and its variants – explicitly named a unified area for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ranslation. This merits some thought.

It could be that everything Holmes called 'descriptive' is automatically historical. But is this a fair reading of what we have on the map? Holmes certainly allowed that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past could be studied under his 'product-oriented descriptive' branch,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 historic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s might not also be studied under 'function-oriented description'. Yet here we run into a series of problems. Does the Holmes map mean history is just a matter of describing objects? Is there no history in apparently non-descriptive slots like 'Translation Criticism'? Do 'Theoretical Studies' somehow stand outs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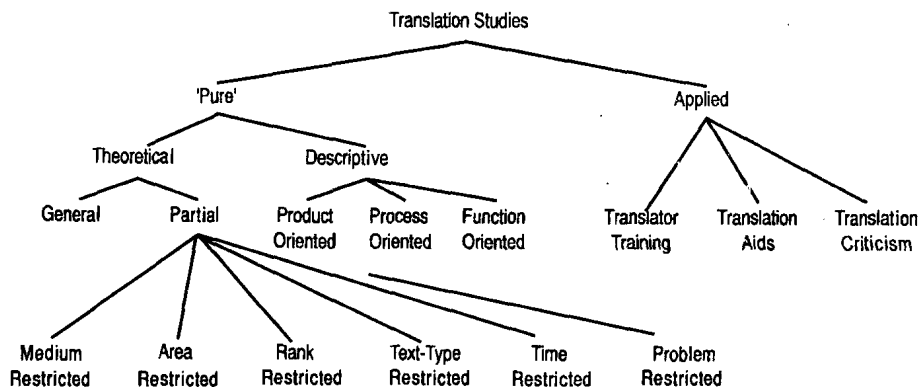


Figure 1

Holmes'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oury 1991:181)

of history? And why does Holmes' theoretical branch only explicitly include history as a possibility for 'time-restricted theories' (specifically the subset dealing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exts from an older period') as well as its obvious role in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72, 76, 79)? Whatever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categories, the field of history is strangely fragmen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descriptive/theoretical divide.

A facile way to overcome this fragmentation is to claim that all the categories are interrelated dialectically. You are supposed to add or imagine little arrows all over the place. Is this a real solution? If arrows really do go from all points to all other points, who would need the map in the first place? Maps name consecrated plots and the easiest routes between them. The Holmes map suggests translation history has no consecrated plot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historians of any but the narrowest variety would seem condemned to jump from one patch to another, describing products here, analyzing functions there, and finding themselves marginally implicated in a meta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lot. The Holmes map also omits a few areas of possible interest: it delineates no ground for any specif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nor for historiography as a way of applying and testing theories (although this is certainly what Holmes wanted us to do). Despite its many virtues in its day, I suggest the map is no longer a wholly reliable guide.

I sow these few doubts because some scholars, notably Gideon Toury (1995:10), see the Holmes map as mandatory orientation for any work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indeed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whole. Whatever we do now, it seems, should be located somewhere within the schemata inherited from